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向着胜利，关键的抉择

——重走花界读懂“通道转兵”

新华社记者 刘紫凌 袁汝婷 周勉

距离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溪溪镇不远，有一条不起眼的山路，长约5.5公里，名叫花界。

1934年底，许多红军战士接到一份“万万火急”转兵电令，走过花界，走上通往胜利的道路。

花界，从此有了特别的意义。58岁的溪溪镇兵书阁村农民吴泽文，在这条路上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爷爷告诉他，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开过一场“了不起的会”，那场会议最终改变了中央红军的行进路线，于危难之际开辟了生机。

1934年12月12日那场“了不起的会”，生死攸关。

参会者共七人：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毛泽东，他们激烈地争论：红军该向何处去？

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当时，蒋介石调集了近20万精锐部队，在红军北上湘西的路上张网以待，等着红军“自投罗网”。

惨烈的湘江战役给中央红军带来重创，不少人都处于彷徨迷茫之中。

李德的翻译伍修权曾写诗：“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12月10日，中央红军攻下通道县城（如今的通道县县溪镇）；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

“通道会议”上，博古、李德坚持要红军按原定的战略方针，立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却坚持反对博古、李德的意见。他根据敌情变化，实事求是，据理力争，提出红

军应当避实就虚，西进贵州，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

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

当晚19点30分，中革军委根据会议决定发出“万万火急”转兵电令，中央红军由此改变行军路线，转向贵州。

湖南省通道转兵纪念馆里，陈列着这份“万万火急”转兵电令的复印件。纪念馆宣教部部长、讲解员栗秋梅介绍，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足见其重要性。

纪念馆馆长、副研究馆员郑湘介绍，“通道会议”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中央红军遭受巨大损失的战略方针；中央大多数领导人赞同、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从而为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和毛泽东进入中央实际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刘伯承《回顾长征》文献资料记载：部队在12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郑湘说，“通道转兵”是长征史上一次不可磨灭的历史抉择，“它于万分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许多年后，人们在回忆和书写长征时，把它称作“伟大转折的开端”。

尽管红军长征在通道境内只有短短9天，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故事，却在当地老百姓中广泛流传。

“爷爷说红军长征路过村庄，村民给他们吃东西，他们会悄悄把钱留在灶台上，借住了村里的屋子，也留下住宿费。”吴泽文说爷爷提起红军时经常满含敬

佩，“红军吃得苦，不占百姓便宜，最得人心。”这是吴泽文自幼便听过的话。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吴泽文曾挑着粮食、穿着草鞋，跋涉在花界这条“红军路”上，有时一天来回好几趟。山路陡峭，雨雪天更是难走，疲惫的吴泽文摔过许多跤，忆起爷爷所说“花界是红军转兵走过的路”，他更加体会到了什么是“吃得苦”。

地处深山的兵书阁村曾是深度贫困村。数十年来，花界是村里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路。

关于路的困窘，经过多年修整，如今，村里不仅通了宽阔的水泥路，通组公路和入户道路也全部硬化，小汽车现在可以从城里一直开到家门口。

路通了，日子也好起来了。为了帮助建档立卡户吴泽文发展产业，对口帮扶的干部一个月上门三四趟。“我看到他就安心，可能就像当年爷爷看到红军一样。”吴泽文说。

如今，吴泽文家养起了稻花鱼，种上了钩藤，儿子找到了工作，家庭年收入六七万元，早已脱了贫。

路修好了，花界上渐渐不再有村民行走，但“守护花界”却成了村民们的默契——

这里从未发生过山火，也没有人乱砍滥伐，村民们怀着同样的敬畏，“因为花界是红军走过的路。”

令村里人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花界会成为一条“富民路”。

“村里的脱贫攻坚，也要发挥‘通道转兵’精神。”扶贫工作队队长罗平想，“首当其冲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换言之，就是要充分考虑村里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谋发展。

经过扎实调研，罗平带领工作队，将红色旅游作为重点产业。

2020年5月20日，兵书阁红色文化体验馆正式开园，辐射到5个曾经的贫困村，带来可观收益。重走花界，成为其中重要的红色旅游体验项目。

崎岖狭窄的花界，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当年红军走时的样子。大半年以来，两万余人来这里旅游，其中许多人走上花界，寻访长征足迹，接受红色教育。

花界，当年是生机之路，如今是小康之路，也永远是初心之路。

80余年前，于万分危急关头，“通道转兵”将中央红军指向转危为机的道路。这一抉择所蕴藏的红色基因，穿越时空，映照今日——

征途漫漫，每当遇到荆棘障碍、坎坷曲折，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斗争，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

无论时空如何变换，“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智慧与担当，始终是一个百岁大党行稳致远、生命力的所在。

“‘通道转兵’的精神有16个字：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纪念馆里，郑湘向参观者讲述，“不忘来路，方能致远。”在郑湘看来，这是当地老百姓努力守护花界的原因，也是更多人前来聆听转兵故事和重走花界的初心。

距纪念馆不远，是兵书阁村的村部。院子里挂着醒目的横幅，写着：“巩固和提升脱贫成果，强力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冬日暖阳下，罗平和吴泽文等人坐在院子里聊新春计划。吴泽文说，来年他打算改造、承包十几亩鱼塘，“再多找（挣）点钱，继续把日子过好。”

“那太好了。脱了贫，乡村振兴就是我们的‘新长征’，我们一起用‘通道转兵’精神，把这条路越走越红火！”罗平笑着说。（新华社长沙2月5日电）



这是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通道转兵”纪念馆（2019年6月18日报）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这是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恭城书院，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通道转兵”会议会址（2019年6月18日报）。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吴泽文走在红军当年走过的名为“花界”的路上（1月29日报）
新华社记者 周勉 摄



参观者在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通道转兵”纪念馆内参观“湘江战役”场景（2019年6月18日报）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58岁的兵书阁村农民吴泽文走在红军当年走过的路上，这条名为“花界”的路如今还保留着当年红军走过时的样子（1月29日报）。新华社记者 周勉 摄

贫寒农家走出的山西特委书记

——阴凯卿烈士生平事略

左图：1931年11月，年仅27岁的中共山西特委书记阴凯卿英勇就义。他是夏县胡张乡王村人。

下图：安葬阴凯卿烈士的太原双塔烈士陵园。1956年4月5日，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在此为阴凯卿等烈士举行公祭大会。



在太原双塔烈士陵园安葬的烈士中，1931年英勇就义的中共山西特委书记阴凯卿一直被关注。时光的流逝，未能淡去阴凯卿伟大的牺牲精神和革命气节，他的光辉形象，却愈加清晰和崇高。

阴凯卿，又名子明，1904年出生在夏县胡张乡王村的一个贫寒农民家庭。他自幼聪明，性情刚直。13岁时因父亲病故，他被迫辍学。15岁时，他在夏县尉郭一家棉花店当店员。1923年又到太原兵工厂当工人。1925年，共产党员王鸿钧到兵工厂搞工人运动，年轻的阴凯卿听了王鸿钧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共产党宣言》，渐渐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积极参加了工人运动，并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分子。1926年，由王鸿钧介绍，阴凯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阴凯卿受党的委派，在太原兵工厂组织和开展工人运动，发展党员，发动工人参加赤色工会，深受工人拥护，成绩卓著，成为山西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1930年，阴凯卿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后，阴凯卿担任新组建的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1931年任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到1931年4月，太原市共产党员发展到105人，共青团员发展到31人。连同山西其他地区，全省共发展共产党员268人。其间，山西诞生了两

支共产党的武装，一支是党领导组建的晋西游击队，一支是发动“平定兵变”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

首先是中共山西特委领导下的晋西游击队成立。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游击队队员发展到100余人。阎锡山闻讯后，立即派了一个师和一个炮兵团的兵力进行围剿，因寡不敌众，晋西游击队撤离转入陕北，但在晋西人民中间播下了革命火种。

5月，阴凯卿主持召开中共山西特委军事会议，研究“平定兵变”计划。根据中央军委部署，决定把高桂滋部队的3个团拉出来，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以便在五台山一带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中共山西特委决定由军事部部长谷雄一（又名苏亦雄）亲自领导这次起义斗争。

7月5日晚，谷雄一拉出了一支1500余人的起义队伍，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当晚，队伍通过正太铁路，进入河北阜平苏维埃政府辖区。

与此同时，中共山西特委还准备在太原游行示威，举行武装暴动，结果行动失败，党组织惨遭破坏。

1931年7月，蒋介石3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3次围剿。逃到大连的阎锡山认为时机已到，于8月在日本势力的帮助下回到山西，成立山西军法会审委员会，加紧搜捕残

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面对敌人的疯狂搜捕和杀害，阴凯卿毫不畏惧。不仅没离开工作岗位，还想尽一切办法从容应对。9月初的一天，阴凯卿去找一个同志未遇，被敌人抓捕关进拘留所。面对审问，他总是一句话：“找老乡！”关了一周后，敌人什么口供也没拿到，只好将他释放。

阴凯卿被关押期间，为了尽快加强山西特委的领导力量，中共河北省委（当时代行北方局职权）先后派出3个干部来山西工作：一是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郝敬民；二是负责整顿山西党组织的陈伯英；三是河北省特派员任国桢（准备担任山西特委书记）。没想到，郝敬民、陈伯英、任国桢和丁楚元（特委代理秘书长）在太原典膳所18号山西特委秘书处开会期间，敌人闯了进来，他们作为可疑分子被全部抓走。

几个人被捕的当天晚上，清共委员会分头对他们进行审讯。在审讯陈伯英、丁楚元时，摆出的好多刑具吓得陈伯英、丁楚元当场叛变。而此前被敌人逮捕的山西特委军委书记孙斌，也当了可耻的叛徒。他们向敌人供出了所知的一切，并带着敌人抓捕党的负责人。

关了一周的阴凯卿走出拘留所时，并不知道山西特委秘书处已经出事。他到秘书处门口刚上台阶，还未敲门，敌人就抓住了他。但阴凯卿十分机

警，蒙蔽敌人说：“我是找朋友借钱的，连门牌还没看清楚。你们为什么抓我？”敌人只好把他放了。

陈伯英、丁楚元和孙斌的叛变，给山西党组织造成极大损失。在太原和他们接触过的同志都被捕了，阴凯卿在北门外也再次被捕。

阴凯卿在军法会审处关押期间，看到许多党的领导同志被捕，心情非常沉重，对于幸免于难的党的干部依然极其担忧，关心他们的安危。敌人动用了各种酷刑，阴凯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一直坚持气节。敌人让叛徒陈伯英、丁楚元、孙斌现场指认作证，也遭阴凯卿严词痛斥。

1931年11月中旬，山西省临时特种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判处阴凯卿死刑。11月13日，在太原小东门外，阴凯卿被枪杀，年仅27岁。

1956年4月5日，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在太原双塔烈士陵园举行公祭阴凯卿等烈士大会。主祭人、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笈讲话说：他们被捕以后，受尽了各种折磨，始终不屈不挠，使敌人不得不惊叹为“铁汉子”。他们临刑前，都慷慨从容，高呼革命口号，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气概。

本报记者 南辽
资料照片由运城市委党史研究室（运城市地方志研究室）提供
美编 李鹏